

中国
史学
散论

中国史学散论

瞿林东 著

责任编辑：聂乐和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11.5 字数：280,000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5—1467—7/G·1462

定 价：8.00元

自序

这本论集所收入的31篇论文，是1981年至1991年期间陆续写成的。它们所讨论的都是关于中国史学问题，大致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以及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若干理论性认识；二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成就的若干专题研究，有的是对一个具体问题的分析，有的也讲到了对一个时期的史学发展的认识；三是关于中国当代史学发展的一些思考。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写于不同的时间，又并非是作系统的论述，故概而言之，题为《中国史学散论》。

中国古代史学留给我们丰厚的遗产，其中有些是糟粕，是需要剔除的；其中也有许多珍贵品，是可以而且应当继承下来为今日所用的。批判地总结中国史学遗产，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起步，但卓有成效的进展，还是在五六十年代以后。老一辈的历史学家为此作了宝贵的倡导和开拓性工作。七十年代末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应当说，成绩是很大的，是令人鼓舞的。但是也应当看到，对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史籍浩繁的中国史学来说，本世纪在批判总结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远远不够的。其中，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整体性和内在规律性，关于它在理论发展上的形态和成就，关于史学发展同社会生活、历史进程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和认识所得，还只是初步的。从历史的观点和现实的需要来看，这种批判总结、继承、发扬中国史学优秀遗产的工作，需要几代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潜心研究，庶可达到辉煌的境界。在这方面，年轻一代的史学工作者肩负着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本书所收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些论文，是摸索着从理论方面对中国古代史学作若干说明的极初步的尝试。坦率地说，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所提出的问题不可能是全面的，所提出的一些认识也未必是无懈可击的。它们只是表明：作者对于这方面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多少有一点自觉意识罢了。

本书所收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些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论文，涉及到不同时期的史家和史书，或是关于某个重要问题、某个时期史学发展的综论，对于浩瀚的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来说，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局部。它们不过是表明作者在研究上的旨趣而已。

本书所收关于中国当代史学发展的一些思考和评论方面的文章，虽撰于不同的时间，但都是基于以下两点认识而作。第一，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如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一样，也应当继承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即研究当代史学不应脱离对于古代史学优秀遗产的批判继承，而研究古代史学则不应脱离当代史学发展的趋势及其所提出的重要问题，还应考虑到古代史学

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成果对当代史学发展可以提供什么借鉴，以有助于当代史学的发展。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第二，关于中国史学的研究，还应当继承和发扬前人所提出的“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和治史以“明道”的优良传统，以阐述史学遗产中所蕴含的知识、理论、智慧，从而对现实的历史运动有所裨益。这方面的研究领域极其宽广，个人所作出的努力及其有补于社会的实际效果也大小各异，但它作为史学研究者的奋斗目标——教育自己、裨益社会的目标——来说，则应是自觉的和明确的。

八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经历着各种思潮的出现和各种说法的流行，其中也包含着对于中国史学的若干误解。在这本论集中，有的文章则反映了作者在当时的一些不同的认识。

四年前，我在《唐代史学论稿》自序中表示：“我的这本小书，不过沧海一粟而已。我愿继续竭尽愚蒙之思，追随师友同志，跟着当代史学大潮前进。”这话，依然反映着我现时的心境，故赘此以自砺。

瞿林东

1992年2月22日序于
北京师大史学研究所

目 次

自 序·····	(I)
传统史学和史学传统·····	(1)
说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8)
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	(30)
传统史学和历史教育·····	(45)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	(58)
杂谈正史和野史·····	(86)
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	(98)
历史著作语言表述的美学要求·····	(112)
略说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	(119)
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	(128)
司马迁怎样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	(142)
《史记》《汉书》比较·····	(157)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的发展·····	(166)
说《魏书》非“秽史”·····	(182)
隋朝修史的失误·····	(194)
史学家和政治	
——关于唐代史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	(201)

关于《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	(218)
辽金宋三史略论·····	(230)
明代史学特点二题·····	(244)
阮元和历史文献学·····	(259)

马克思和历史科学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272)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杰出贡献·····	(277)
读毛泽东给史学家的几封信·····	(289)
论史学的时代精神·····	(296)
关于历史科学的民族特色问题·····	(306)
历史地看待历史·····	(313)
社会调查和历史研究·····	(321)
历史与认识·····	(329)
谈史学评论·····	(340)
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	(345)
新中国史学四十年·····	(352)

后 记·····	(358)
-------------	-------

传统史学和史学传统

关于传统史学

按照一般的说法，传统，它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长期积累、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思想、观念、道德、艺术、制度、风俗等等。根据这个说法，是否可以认为：我国的传统史学乃是我国历史上长期积累、沿传下来的史学成果。

这只是一个原则的说法。至于怎样认识传统史学所包含的范围，目前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一种看法，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即1978年12月以前的史学都划入“传统史学”的范围。此说之欠妥，我以为主要在以下两点。第一，把1978年以前的史学统统称之为“传统史学”，这不仅把传统史学的范围划得过宽，而且也有悖于“传统”的涵义。第二，把几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史学、同时也把几种不同性质的史学统统称为“传统史学”，这

不仅混淆了它们之间的质的区别，而且也碍于人们真正把握和估价传统史学。所谓传统史学，似以指中国近代以前的史学为宜，也可以说主要是指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史学。这是因为：（一）在我国的有文字可考的三千六百年的历史中，封建社会的历史占了两千多年；这个时期的史学历史悠久，成果丰富，有充分的条件形成一脉相承的系统，和比较稳定的形态。（二）我国封建社会的史学，在形式的多样性、内容的广泛性和现实的时代性方面，都有比较充分的发展，从而具有鲜明的特点，不独在当时，而且对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三）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是传统史学还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了一个时期，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史学的兴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由于社会的变动而引起史学的分化和革新，这时期的史学在许多方面已经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格局。因此，把近代史学纳入传统史学的范围显然是不合适的。（四）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历史断限上，它是当代史学，自无疑义；在科学体系上，它是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必须坚持、完善、发展的事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也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但它作为我国现今史学发展的方向，亦无疑义。因此，把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纳入传统史学的范围看待，那就更不妥当了。

然而，传统史学在性质上却是十分复杂的。中国传统史学，就其整体来说，它既有封建性（如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落后性（如鼓吹“天命”、灾祥）、反动性（如敌视人民群众）的一面，这是我们要坚决摒弃的；同时，它也有民主性（如揭露封建统治的专制和残暴）、进步性（如朴素的唯物史观和进化史观）、时代性（如总结以往历史的经验、提出当前历史面临的重大问题），这是我们应当批判继承的。史学工作者不坚决摒弃前者，就不能克服传统

史学的弊端和缺陷，不能跳出前人的窠臼；不认真地批判继承后者，就不能吸收和发扬传统史学的辉煌成就，不能光大我们民族的优良史学传统。这是我们在史学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

关于史学传统

如果说，传统史学指的是古代史学遗产的话，那末，史学传统乃是这个遗产中那些特点最鲜明、传习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部分，它主要表现为史学家的思想、品德、学风和经验。这里，有三点是应当明确的。第一，我们对传统史学的理解，在时间范围上应有一定的限度，即不应把近代史学甚至当代史学都视为传统史学；而史学传统则因历代史学家的继承和发扬，处于不断地传习和发展中，故不便在时间范围上划定一个限度。第二，历代史学家在继承、发扬古老的史学传统的过程中，往往要根据时代的要求赋予这种传统以新的涵义，同时又在历史研究的新的进展中不断形成新的传统。从中国史学发展的全过程来看，所谓史学传统，它既是相对稳定的，又是不断变动的。第三，史学传统是长期积累起来的，而在具体的形成过程中和表现形式上，则是后来的史学家们对以往的史学家们在思想、品德、学风、经验等方面之优良部分的概括和提倡的结果。在史学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不良的因素一再出现，甚至长期流传下来；但一般说来，不论古人或今人大多对此采取批评或否定的态度，不认为这些不良因素也是可以继承和提倡的。因此，所谓史学传统，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虽然不能不带着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因而不可能是纯粹的和无瑕的，但它毕竟是以往的史学家们之优良的思想、品德、

学风和经验的集中表现形式。我们所说的批判继承古代史学遗产，不仅是指古代史学家所积累的资料、撰述的成果，还应包括反映在史学家身上的种种优良史学传统。

在中国史学的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成果以及层出不穷的史学家中，究竟积累了哪些优良传统？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和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从我们现在已经获得的认识来看，有这样一些优良传统是不应当被忽视的：第一，史学家对于历史记载真实性的责任感。“直书”是优良传统，“曲笔”历来被视为丑恶行为。第二，研究和总结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作为当前做人、处世、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等等的借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①、“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②，是许多史家十分强调的。第三，注重于察往观来。史学家说明过去的事情即所谓“述往事”，是为了展望将来的事情即所谓“思来者”。第四，史学家要具备渊博的知识，并对这些知识领域有相当深度的理解。《隋志》史部后论说的“博闻强识，疏通知远”，刘知几说的“史才”、“史学”、“史识”，章学诚说的“博学强识”^③，就是这个意思。第五，重视语言修养，讲求对于历史的文字表述的艺术性，这是中国史学家所具有的历史文学传统。司马迁、陈寿等，都被后人称为“良史之才”，是“善叙事”的楷模。第六，把撰述历史著作作为不朽之业来看待。他们有的倾毕生精力而为一书，有的经过父子、叔侄、祖孙、师生相传而成就史学事业，有的历尽坎坷而仍以著史为最高志向等等，使这个传统不断得到发扬光大。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当然还不限于此，这里不能一一列举。从上述的这些优良传统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两个方面的认识。一方面，中国史学家对史学工作历

① 《易·大畜》。

② 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中》。

来有一种崇高的责任感；这种崇高的责任感不止表现为对于历史的重视，还表现为对现实的关注。另一方面，中国史学家由于对史职的尊重而对于自身修养历来有很严格的要求，从刘知几提出“才、学、识”，到章学诚明确提出“史德”，就是对这种严格要求的概括。而这两个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因出于崇高的责任感而能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又因有了这种严格的要求才使崇高的责任感成为现实而不致流于空言和幻想。

关于继承和创新

对传统史学的考察和对史学传统的总结，都是为了今天的史学工作，都是为了史学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有新的创造。因此，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都不应忽视的。

关于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我以为在认识上和实践上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继承是创新的前提之一。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时代的史学，都是在前人提供的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创造出来的。《史记》、《通典》、《资治通鉴》等巨著的产生，莫不如此。否认这个“前提”，则无以谈论创新。郭沫若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有力地证明了任何创新都不能没有这个“前提”。

第二，继承传统，但不应局限于传统，任何创新，都是对于传统的突破。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保存遗产，并不像档案保管员保存故纸堆那样。保存遗产，完全不等于还局限于遗产”。^①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148页。

我们对待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应采取这种态度。任何史学，都是一定的时代的史学，因而都是一定的时代精神的反映。中国史家历来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但我们今天对这个传统的认识跟前人是不完全一样的。范文澜曾经说过，“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广泛占有确实可信的资料，坚守晋董狐、齐太史直笔而书的传统史德”，是中国史学工作能够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几个条件。^①这里说的“直笔而书”，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和确实可信的资料作基础，而具有崭新的含义。我们今天讲历史教育，已不限于所谓“君子”，甚至也不限于一般的“树之风声”，而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我们今天采用综合体撰写史书，这对于传统的综合体（纪传体）来说，于继承中又有了重大的发展，等等。可见，从史学工作来看，没有继承，固然谈不上创新；不立足于创新，也不能做到真正的继承。这是继承和创新的辩证法。

第三，吸收外国史学的有益成分，也不能完全脱离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史学的创新，一方面要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要吸收外国史学的有益成分，这二者是不应偏废的。但对于后者的吸收如若完全脱离了对于前者的继承，则只能视为模仿而与创新无涉。侯外庐先生在四十年代曾经郑重地指出：“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发掘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②这无疑是中国学人的历史性的变化。对于任何新理论、新方法，如不能用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发掘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那还有什么实际的社会价值呢。陈寅恪论中国思想史时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

^① 参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80页。

^② 侯外庐《中国古代学说思想史·再版序言》。

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① 他们的这两段话，把继承民族文化和吸收外国文化的关系，以及它们跟学术上的创新的关系，讲得十分中肯，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 . .

我们重视传统史学，但这种重视不是不加分析的。我们总结史学传统，因为它们是中国史学优秀遗产的一部分。史学的创新，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时代精神同“继承”、“吸收”恰当地结合起来才能够实现的。

（原载1987年4月22日《光明日报》）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

说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提要】 中国古代史学及其优良传统，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宝藏，而且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深刻的历史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核心。恢廓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相结合，求实和经世的一致，继承和创新的统一，以及讲求文采、重视考据、探索理论等，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几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史学中也有不少谬误和糟粕，但它们掩盖不了这些优良传统的光华。总结、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对当前的史学工作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有极丰富的史学，它在3000多年的发展中，逐步培育和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宝藏，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

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尤其是5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些成绩，不论在系统表述方面，还是在理论形式方面，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这对于促进当前的史学工作，促进中外史学交流，都有重要的意义。

前几年，我陆续写过几篇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文章。今年春

天，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教授命题嘱为此文，却之难，应之亦难。于是勉为此文，概括地说几点认识，以就教于读者和同行。

一 深刻的历史意识

中华民族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的民族。从《尚书·召诰》说的“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到龚自珍倡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①这种历史意识从古代一直贯穿到近代，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史学历数千年而绵延不绝，史家、史著代有新出，史观、史法不断进步，正是这种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之民族特点的反映。

西方思想史、科学史上，有两位名声显赫的学者惊叹于中华民族所具有的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一位是黑格尔，他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②另一位是现时还健在的李约瑟博士，他在论到司马迁关于商代历史的撰述时写道：

一般认为，司马迁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一千多年以前的史料来写历史。可是，当人们从无可争辩的真迹——安阳甲骨文——中清楚地找到商代30个帝王中的23个帝王的字时……大家可以想象，许多人该是何等地惊异。由此可见，司马迁一定拥有相当可靠的史料。这一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也说明商代是完

^①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尊史》。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第161页，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

全应该承认的。”^①

他们是从世界各民族的特点和“中国人”这个整体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因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通过史学的发展，反映在历史观点上的成就，首先，是认识到历史、现实、未来的联系，如司马迁说的“述往事，思来者”。^②其次，是承认历史是变化的，如《左传》引史墨说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昭公三十二年）。因此，“通古今之变”成为史家追求的目标之一。再次，是肯定历史在变化中的进步，如杜佑论分封、郡县利弊，认为“建国利一宗，列郡利百姓”；^③论民族风尚，认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④论人材，认为“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⑤等等，反映出鲜明的历史进化思想。还有，这是最突出的一点，认为历史可以为现实提供借鉴，如司马光所说“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⑥这些历史观点，还有其他一些进步的历史观点，在中国古代史学中，每一个方面都有丰富的积累。

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同时又反转过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秦孝公时关于变法的辩论，汉初关于秦亡、汉兴的总结，以及后来关于盐铁的辩论，唐初关于秦、隋兴亡比较的探讨，以及关于严刑罚、行教化的辩论和关于分封的辩论，都直接影响到当时政治上的重大决策。恰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导论》，中文版第88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②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③ 杜佑《通典·职官典十三·王侯总叙》。

④ 《通典·边防典一·边防序》。

⑤ 《通典·选举典一·序》。

⑥ 司马光《资治通鉴表》。